

● 新闻传播

网络传播的“后现代”特性^{*}

秦志希, 葛 丰, 吴洪霞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秦志希(1948-), 男, 湖北鄂州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新闻理论研究; 葛 丰(1972-), 男, 湖北恩施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大众传播管理研究; 吴洪霞(1976-),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中西新闻比较研究。

[摘要] 电视虽然呈现出后现代的某些特点, 但只有由电脑技术支撑的互联网才充分显现出后现代的真正来临。互联网技术的成型经历了一个“从大到小”、“从隔离到兼容”、“从集中化到分散化”的过程, 潜藏着一种消解中心的文化理念。网络传播消解着传统媒体以传者为主体的“中心——边缘”的传播模式, 使传播权力发生流变。网络主体行为个性化使得网络语言的述行性颠覆现代语言的各种规则, 网络叙事则表现了对“元叙事”的“不信任”而倾向于“去中心化”的“小叙事”。我们要以积极的文化态度辩证地对待网络的后现代特性。

[关键词] 互联网; 后现代; 特性

[中图分类号] G 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6-0760-07

当互联网这一新媒体升腾于地平线时, 几乎全世界的人们都惊叹它给人类带来的诸多便利与好处, 而时隔不久, 人们又发现它对现存秩序的种种挑战, 于是历数互联网的负面效应与要求加强管制的呼声不绝于耳。赞叹也罢, 管制也好, 但当下首要的, 似应从宽泛的文化背景中去解读它。

麦克鲁汉强调媒介技术本身对整个文明/文化决定性的影响, 他指出: 媒介作为人体的延伸, 对整个心理和社会的复合体都产生影响。因此, 特定性质的媒介事实上是特定文化的标帜。印刷媒体即是现代文化的象征, 而电子媒体则是后现代文化的代表^①(第8页)。身处20世纪60年代广播电视大众传媒的电子时代, 他预言式的宣告“现代”思想的破产, 电子“后现代”的来临。他认为, 原先的社会使地球上的“村落”“都市化”——由分散走向集中, 电视等电子媒介实施着反“都市化”, 即消解集权的“重新村落化”。不仅麦克鲁汉而且包括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都将电视、电脑统称为后现代媒介。但其后人们发现的是, 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不仅没有消解中心, 反而强化了电视台等传播机构的集权和垄断。从某种意义上说, 电视虽然呈现出后现代的某些特点, 但只有由电脑技术支撑的互联网的出现, 才最为充分地显现后现代的真正来临。

电脑一经出现就进入到诸多后现代哲人的视野中。法国当代思想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创导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 描述了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就是计算机化的社会和信息社会, 后现代社会的知识状况受到诸如电脑语言、信息传播、信息储存与数据库、远程信息

* 收稿日期: 2002-08-08

处理技术等的冲击。由此,知识被计算机化、量化以及商品化。另一个被称作是“后现代主义的大祭师”的鲍德里亚尔认为,后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由电脑、电视、模式和信码所支配的信息和符号的时代,这是一个缺乏参照物的超现实的“仿真”时代。从特定意义上讲,电脑——互联网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典范,后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由电子、电脑宰制的社会。后现代主义正是对计算机化了的社会所作的哲学和文化上的描绘。

但问题在于,人们对于后现代本身的解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吉姆·柯林斯指出,后现代主义“既没有一种词原学,也没有一种进化程式,更没有一种涵括一切的理论范式能够提供一种适于解释后现代主义的定义”^[2](第336页)。伊哈布·哈桑说,“后现代主义也有一种语义不稳定性的缺陷”,“有不确定的内在性倾向”^[3](第229页)。一般而言,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它最早在建筑,而后涉及艺术、文学、语言、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等观念形态的诸多领域。它以所谓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为背景,以逆向思维分析方法批判、否定、超越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今西方世界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一般认为,“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概念等则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后现代主义’正是对于这些特征的概括”^[4](第2页)。席沃尔曼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与艺术》一书中称后现代“致力于意义、同一性、中心、统一性的消解”。哈桑在《作为革新者的批评家》中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摧毁”。可以说,后现代诸多特征的共质乃呈现为一种“消解”与“颠覆”——对于现代文化的消解与颠覆,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消解性极强的文化形态。

一、互联网对技术中心的消解

凡技术都隐含一定的文化潜质。互联网的后现代性根源于网络技术本身。因此,从文化角度读解互联网,不能不首先从技术入手。

最早的电脑可以说是一种技术权威、技术精英、技术中心的象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则是对这种技术中心的消解。互联网技术的成型经历了一个“从大到小”、“从隔离到兼容”、“从集中化到分散化”的过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本身潜藏着一种突破禁忌、无视戒规、摧毁中心的文化理念。

我们知道,电脑诞生于美国,最早被政府以及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所控制。1959年美国明尼苏达州CDC公司制造了第一台商业主机型电脑。主机型电脑是一种控制数据的“中心化机构”,是政府、企业垄断性处理信息的设施,它是权力中心化的象征。其后,由一批批反叛技术权威的人们像西部牛仔似地闯进电脑技术领域。20世纪60年代,这些人把主机型电脑转化成了实际效果等同于后来的个人电脑的电脑。到70年代,这些人发明并制造了这种个人电脑。80年代他们为个人电脑设计了各种软件,使个人电脑大规模地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而此后,他们又使PC成为网络化的PC,使美国国防部的阿帕网最终转化成全球性的互联网。

互联网及个人电脑的出现,标志着技术——权力中心被摧毁。由最早的主机型电脑到后来的互联网的个人电脑,恰与印刷术发明前后的社会文化有某种历史的相似性。中世纪社会基本上是围绕着圣经这一文本中心而旋转的。那时,能接触并垄断这一中心文本解释权的只是社会上极少数的牧师,他们成为了中世纪社会精神权力的中心。印刷术发明后,圣经被译成多种文字,人人皆可阅读并解释圣经的意义,于是,社会集体式行为始而解体,出现了宗教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从传播的角度看,是印刷术及其媒体摧毁了中世纪的宗教集权。同样,我们可以说,是网络动摇着现代技术的精英统治。正因如此,尼葛洛庞蒂把控制着主机型电脑的信息权力机构,视若中世纪“刻意维护自己独尊的地位”的基督教会。

现今,人们在网上皆可通过个人电脑自主发布各种信息,真正享受着过去难以实现的传播权。从主机型电脑到个人电脑,是一个挑战独断、权力、集中、控制的过程,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由“现代”到“后现代”的文化转化和生成的过程,它标志着—一个重新部落化、重新个人化的新文化时代的来临。

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过程中, IBM 公司和苹果公司的教训特别值得一提。比尔·盖茨认为, IBM 在计算机发展史上的教训是对个人计算机的作用认识得太晚。80 年代初, IBM 在硬件领域是无可匹敌的, 占据了 80% 的大型计算机市场, 但当时的公司执行人员并没有意识到个人计算机将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 而认为小型机器只能在低档产品中找到出路。这实际上是忽视电脑“从大到小”、“从集中化到分散化”的发展规律。而 IBM 所忽视的商机却被新成立的康柏公司抓住, 并很快使之成为美国商界一个空前成功的例子。苹果公司的教训在于, 他们所实施的策略是拒绝“从隔离到兼容”的电脑发展规律。他们设计计算机时故意和别的公司的计算机不兼容, 使用户一旦用上他们公司的计算机, 就逆来顺受地接受该公司所提供的一切, 致使它在之后的 IBM 和微软合作开发的兼容性很强的操作系统软件面前陷入尴尬地位。盖茨总结道:“由市场本身推动的兼容性问题, 对未来的个人计算机工业来说, 是一次重要的教训”^[5](第 53 页)。由 IBM 公司和苹果公司的教训可知,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蕴涵着民主、开放、自由、个人化的“后现代”文化内涵。

从另一层面看, 从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快节奏看, 网络的成型、发展同样处在一个不断“去中心化”的“后现代”状态中。乔治·吉尔德认为, 消解、侵蚀“中心化机构”的是微芯片和光纤技术的加速发展。决定电脑产业的是“晶体管和网络电子学的爆炸性进展”, 摩尔定律认为单个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每 18 个月就翻一倍。当今电脑行业一个流行的观念是: 一种技术一旦投入市场, 就意味着这种技术已经过时。从 286 到 386、486、586……电脑使人得了一种“集体强迫症”, 迫使人们不断为它升级, 电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数字时代永远处于“没有尽头的青春期”^[6](第 102 页)。在这种日进月迈的发展态势下, 数字技术遵循它自己的生存意志, 这种“技术意志”超越任何人类“权力意志”的直接控制, 人对于技术并没有自主性, 虽然技术的发展必须由人来实现。数字技术没有永恒的中心, 也不相信权威, 而是相反, 不断消解、颠覆这一切。如今, 网络技术各方面的突破性的进展, 最终呼唤一个文化领域中的质变时代的到来^[7](第 35 页)。

值得玩味的是, 在从主机型电脑到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历程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们, 恰是一些“非学院化”、非主流技术圈的“异端”的人们, 诸如被里德学院开除的“嬉皮士”出身的乔布斯、“男孩总裁”比尔·盖茨、一度被视为“离经叛道”、“江湖骗子”的尼葛洛庞蒂等。他们挑战习俗特权、冲破禁忌, 作为主机型电脑的“肢解者”、“捣毁者”, 多少带有反社会、反文化的气息。然而又应看到, 他们的漠视“常规”, 离经叛道, 其中又蕴含着具有个人独立性的“自我依靠”的伦理。他们以“自我依靠”的伦理解构主流技术权威, “没有‘自我依靠’的黑客伦理, 赛柏空间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8](第 101 页)。可以说, 正是这些人身上所体现的“后现代”精神, 才可能完成从主机型电脑到互联网个人电脑的技术发展。

二、互联网对传统传播权力的消解

传播技术的发展导致传播权力的变更。互联网呈现出与传统媒介不同的“权力流变”。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传播蕴涵着这样的权力结构:“把关人”在控制信息传播时, 处于“决定媒介内容”的支配地位; 传统媒介基本上是以“无回应的言语”实施着以传播者为主体的“中心——边缘”的传播结构模式。传统媒介的传播模式往往从一个层面上推行着总体化策略, 将多种性简化为一致性, 或者朝着一个目标去组织话语。久而久之, 就可能造成如批判学派称之为的“单质的社会、单质的人”。

怀特·米尔斯提出“权力精英”的概念正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传统媒介的权力实质。怀特认为, 权力精英可以占据一个超越普通人、普通环境的关键性位置, 能够聚合一切有效手段, 持续获取财富、声望以及权力; 但“强者”的价值终需建立在其所处的机制上。举例来说, 如果没有国家(机制), 总统(权力精英)将形同无物。因此权力精英仍需疏通与主要机制间的联系渠道, 才能有效掌握权力。传统媒介的“把关人”正是占据一个超越普通人、普通环境的关键性位置上, 以“权力精英”的身份而出现, 他身后所依托的正是社会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

在传统媒介中惟独电话具备去中心化的特质，它能使任何发话人与任何受话人进行互动交流，而当今惟一能与电话的民主结构媲美的技术就是因特网。网络传播的互动方式取代了传统媒介的播报方式。“权力精英”的把关人已被“网络负责人”这个机械性功能的角色所取代，不再具有传播主控权力。网络化的个人电脑成为冲击传统媒介造就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结构的急先锋，使这种结构造成的文化和信息的垄断与独裁被彻底打破。本来，人类传播源自个人间的人际传播，随着文明的演进，使得信息传播发展成为高度组织化、职业化、制度化的活动，而网络又使传播回归人际性，“重新部落化”。在数字化时代，地球才真正成了一个既大又小的村落。正如尼葛洛庞蒂所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沙皇退位，个人抬头”、“消解中心主义”的时代^[8]（第25页）。

传统传播主体的消解与变更，是传统媒体与网络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区别。“把关人”的权力瓦解后，无数个人化的传播主体浮出水面。读解网络权力的关键就在于对新的传播主体的理解。我们看到，在新的传播主体身上蕴含着比传统传播主体更为丰富而多向度的文化内涵。网络主体具备虚拟性，除了角色代码和纯文本之外，一无可视性身份特征。网络主体在虚拟中通过想象创造着自我身份，并且使这种身份表现为多样性、随意性。可以说，网络主体较之于传统传播主体是由真实走向虚拟，由确定走向不稳定，由单一走向多重，由集中走向分散。传统传播主体是依托于启蒙主义的理性观的基础之上的，强调“个体是理性的、自律的、中心化的和稳定的人”。后现代社会所培养的身份形式与现代社会的身份形式存在差异甚至对立。网络后现代性的交往实践所构建的是“不稳定的、多重的和分散的主体”^[7]（第45页）。而按吉姆·柯林斯的说法，后现代理论中富有意义的一个拓展，就是认识到必须发展一种新的主体理论，这种主体就是一种“多元而矛盾的主体”^[2]（第336页）。于是，传播主体的变更使网络传播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景观来。一方面，分散多元矛盾的主体带来了网络传播自由、多元和开放的优势，可以排斥传统媒体单质化的负面效果；另一方面，由于网络主体的分散多元矛盾，又使网络传播呈现“无政府”状态、“个人主义”色彩；一方面，网络主体身份的个人化认同，可望实现一个自由、平等、自主交流意见的“公共领域”。网络个体作为自主的存在，他们各具独特的领域、独特的境界，在网上不期而遇，可以在交流中实现“和而不同”，整合成真实的民意，从而主导虚拟空间并进而影响现实生活；另一方面，网络主体身份的个人化认同，显示个人对传统政治和阶级身份的认同的淡漠，从而造成政治生活的个人化和分散化，不利于传统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安全。在这方面网络正典型地显示出世界范围内身份依附对象转移、“新认同政治”的最一般趋势。一方面，因为网络主体的虚拟摆脱了现实中的诸多制约，致使传播有可能呈现出“真的自我”来，以实现人与人真正的交流与沟通，构筑起新型的“虚拟社群”。另一方面，网络主体的不稳定性，网民摆脱现实的监控和责任，易使传播内容流于粗俗狂野，成为无聊情绪的发泄；一方面，文化忧患者认为，西方文化占有网络主体的绝对优势，网络传播可带来霸权性、颠覆性和新的不公正、不公平，反方可答曰，网络主体的多元化、非集中化正是对于西方启蒙时代所建立的中心式制度的挑战。网络消解“把关人”集中、独断的权力后，世界某些弱势文化也可能成为主流倾向，这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我们在没有认识网络主体丰富而多向度的文化内涵之前，时而放论网络的进化优势，时而指陈网络的负面效果，都振振有词，但都未能从根源上理解网络本身。

总之，虚拟中的网络主体，失落了现实中的相互关系及其等级界限，也消解了专家、权威对现存社会、生活领域的主导权。于是，网络权力现状就存在于网络主体及其相互关系中。

我们要认识互联网的传播权力有必要了解后现代者米歇尔·福科的权力理论。福科消解了“权力精英”的观念，将关注点由国家政治经济权力延扩为日常生活的权力网络。他认为后现代特征乃在于有空前繁多的权力核心，以及不计其数的流通节点，权力关系在其中得以维系、支撑，并散播于四界。它无法被单一主体固定永恒地“获得、夺取或分享”，只是随处运作并表现为高度的不确定性。他倾向于将权力诠释成分散的、不确定的、形式多变的、生产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分散多元而矛盾的网络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正决定着网络权力呈分散的、不确定的、形式多变的、生产性的特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权力的形成、运作是完全不确定的、无序的，仅将对网络权力的理解停留在

网络主体间力量的离和聚散也是不够的。我们应看到,网络权力的展现,是通过网民的言说——话语来实现的。而特定的话语总是与特定的文化、知识相关联。因为文化、知识乃为话语提供真与伪、正确与错误、合理与不合理的规范和标准,由此而允许某些话语存在,并排斥另一些话语,这就使得话语成为了权力的话语。当人们在网上“以言行事”时,也就构成了一种特有的力量^[9](第 137-143 页)。由此我们可以说,网络权力在实质上是话语中的文化、知识的权力较量。网民既是虚拟的角色又是现实中的人,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中的规范、伦理携带到网上,使网上交往具备现实交往的仿真性。可以说,网络传播的“权力关系”是在虚拟空间中模拟、重塑现实社会的权力运行状态。网络权力被置身于日常现实与虚拟之间。所以,我们既不能把网络权力看成是纯然虚拟世界的产物,也不能以单一现实的眼光去审视它。

三、网络对现代语言及文本规范的颠覆

现代语言学的转向,超越了语言工具论的界说,也突破了修辞学的领地,认定语言作为话语存在,乃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正如英国学者斯温伍德所说:“语言只存在于使用它的主体之中”^[10](第 135 页)。语言与人的本真存在休戚相关,语言是人的存在家园。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媒体更倾向于科学语言而轻视自然的“生活语言”,它注重语言的社会性而轻视语言的主体性,注重语言的规范性轻视语言的个性化。传统媒体体现了科学对元语言的追求,对天然语言、生活语言的扬弃。只要我们听一听、看一看严肃媒体的新闻播报,即可感受到它的规范、严整。一方面它强化了语言作为公共交流媒介的共性,同时另一方面,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科学规范的元语言可能导致人类思想语言的全面逻辑化和程序化,它根据技术操作原则,将词与物变成单一严肃的对应阵列,可能剥夺语言的创造功能乃至生命,给人带来一种“单轨思想”,最终造成人类语言蜕变和思想萎缩^[11](第 186 页)。

从后现代看来,网络主体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主界定的客体,网络主体行为个性化是其最主要的特征,这使得语言的述行性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网络语言可以说是语言的“重新部落化”。网络语言似乎有意颠覆现代语言的各种规则。在网上,人们重返部落时代,用原始性符号表情达意,如“笑”以符号“:-)”表示;“哭”以符号“:-(”表示;两眼发花为“%-)”;喝醉了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现代语言高度重视语言的纯洁性,可在网上,人们似乎在有意破坏这种语言的纯洁性,请看这样一段话:“7456, TMD! 怎么大虾、菜鸟一块儿到我的烘培鸡上乱灌水? 94 酱紫,呆会儿再打铁。886!”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气死我了,他妈的! 怎么超级网虫和网络新手一块儿到我的个人主页上留言? 就是这样子,呆会儿再来贴帖子。拜拜了!”在这里,汉语、数字和英语字母,现代词汇、口语谐音和骂人的粗话杂糅在一起,明显不符合现代语言规范和纯洁性的要求,而且非网虫也难于看懂,但这种现象却成为一种网语时尚。

在现代语言甚至是古代语言中,命名一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因为给事物命名并由此取得共识乃是人类进行交流的一个基本前提。可网络中的命名则显出极大的随意性。如将“E-mail”称之为“伊妹儿”或称“妹儿”,将讨论区域的当值版主戏称为“斑竹”,就多少有点儿诙谐。致如访问者的自我称谓更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什么“南洋和尚”、“天目”、“六秃子”、“臭脚 0431”,应有尽有……这与现代人的名称已大异其趣。现代人的名称有姓与名的区别,且多少追求一种意蕴、内涵,网络人名则颠覆了姓与名的界限及其基本的规定。总而言之,网语是对于现代语言规则的全面颠覆,并由此显示其后现代性。

语言决定人的存在及其人类文化本身。巴尔特曾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文化都是一种语言。”^[9](第 186 页)换种说法,语言乃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也因此,维护语言的特有规范和纯洁性,实关系到文化自身的延续与发展,不能不给予高度的重视。从这一角度来看,网语挑战规范,多少有一点反文化的意味。但是,网语的反常规,又表明了现代语言制度的某些偏颇缺失。从本体意义上看,网语追求高度的自然性、个性化、人情味,也即是追寻语言本身已失落的天然性,这正使语言重新获得一种生命的灌注。网语对现代语言的挑战,体现了后现代对现代性信赖的批判,它或许多少带有“五四”时期反文言张白话的意

味。

如果说网语是对科学元语言的反抗,网络叙事则表现了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叙事立场是探讨后现代的一个中心。利奥塔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一种“不信任态度”。因为现代性话语提倡元叙事,倾向于排他、普遍化及同质化的元律令,即理性或逻各斯。他提倡向“小叙事”的转变,因为小叙事坚持“语言游戏的异态性质”,以使差异合法化,使“不可呈现之物”受到重视,并能摆脱元叙事的工具性逻辑^[7](第50页)。后现代认可个性化的小叙事,也即是叙事的“去中心化”。在后现代者看来,传统媒体不仅倾向于科学语言而轻视自然的“生活语言”,而且它总是实施着“总体化”叙事,按照工具理性逻辑朝着某一个方向去组织话语,以实现政治、思想的单一化。而个性化的小叙事形成多重话语或歧见的百家争鸣状态,则可避免这种政治危险的发生。后现代实证少数人话语是对启蒙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否定。在网上,多元分散而矛盾的网络主体的小叙事,使网络的各种信息、内容呈“拼凑”状态。网络新闻并不像传统媒体那样,按某种意志将传播内容实行“有意味”的排列。吉姆·柯林斯将这“拼凑”视为后现代的一个特点。网络如同后现代主体一样,是“多元而矛盾的文化信息相互作用的一个场所”^[2](第345页)。

链接技术使网络文本具有超文本的特征,突破了传统文本的自足与封闭。人们可以在网上以接力的方式写小说,这小说的结局可以是多样化的;在网络新闻的末尾,人们可以加贴子,发表各自不同的见解。网上人们更可以漫无边际地聊天。网络多用户域显示文本无边界的开放性。而网络阅读,通过链接技术,更是可以跨越不同的信息、文本、站点,甚至跨越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媒体。网络的超文本颠覆传统媒体的线性的、自恋的、封闭的和等级的传播模式,它为个人的思维、心灵和情感的展示提供了一个无疆界的广阔的空间。

网络超文本、超媒体所呈现的海储量,表现为一种文本过剩、信息爆炸,而这正是构成后现代性的一个核心因素。如果像有人所说,电视在造成这种状态的过程中,将所有富有意义的行为,降解成为取代现实的无边无垠的电视世界中的“胡言乱语”,以阻碍人们获取真知,那么,网络则通过强有力的搜寻技术使每个人在海量的信息中十分便捷地得到他所想得到的一切。电视的后现代性是将人淹没于文本过剩和信息爆炸之中,网络的后现代性则表现为在文本过剩和信息爆炸之中更突兀人的个性存在。

四、如何面对网络的后现代性

综上所述,互联网所表现的后现代特征,集中表现于对现代文化的消解、颠覆,由此对全球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复杂的影响。这种消解与颠覆从文化源流上讲,首先即是对西方启蒙主义所奠定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的挑战,它体现了西方文明自身的精神危机。后现代思潮反思、批判现代文化的偏颇,无疑有其合理性,但由此而走向全面否定现代文化本身,却是错误的。所以,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从他们的文化立场来看,对于后现代思潮也不都持肯定态度。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指出,如果消解一切中心,会造成社会的文化危机,“这些危机能使一个国家瘫痪,给人们的动机造成混乱,促成及时行乐意识,并破坏民众意志。这些问题都不在于机构的适应能力,而关系到支撑一个社会的那些意义本身”^[12](第73-74页)。这说明,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不可“缺乏中心”。本来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理念就是主张消解中心和权威,反对文化霸权,张扬个性和民主平权的,但是,它借助网络全球化的传播力量,却又自行扮演着领导世界文化新潮的角色,对世界各民族文化包括中华文化既有的价值体系实施冲击和消解。网络在对各异质文化实行消解的同时,又在实质上实施西方文化的同质化,因为网络的各种技术标准基本上都是西方的,网络的主体及语言的绝对优势也都在西方。网络的全球化就可能在“消解”的旗号下悄然推行文化的垄断化、同质化。我们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

网络所表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网络既蕴含着一种新的文化特质,也就要求我们不能以传统的思路、方法对待它,目前特别不能为了加强管理而钳制甚至扼杀它的优势,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凭借这种优势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世界性播散和复兴的大好机遇。我们必须在一

种新的文化视野中审视网络,化而用之,凭风御空。

[参 考 文 献]

- [1] [加] 马歇尔·麦克鲁汉. 理解媒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 [2] [美] 罗伯特·C·艾伦. 重组话语频道[M]. 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0.
- [3] 包亚明.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后现代景观[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 [4] [美] 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5] [美] 比尔·盖茨. 未来之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6] 吴伯凡. 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 [7] [美] 马克·波斯特. 第二媒介时代[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8] [美]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6.
- [9] 周宪. 超越文学[M]. 上海:三联书店, 1997.
- [10] Swingewood A. Sociological Poetics and Aesthetic Theory[M]. London: Macmillan, 1986.
- [11] 赵一凡. 欧美新学赏析[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 [12] [美]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责任编辑 车 英)

Postmodernism of Internet

QIN Zhi-xi, GE Feng, WU Hong-xia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QIN Zhi-xi (1948-),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journalism theory; GE Feng (1972-),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ss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WU Hong-xia (1976-), femal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journalism.

Abstract: It is Internet supported by the computer technique that fully reveals the real coming of the postmodernism, though TV gives us some signs too. The shap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experiences a course *from big to small, from separation to compatibility, and from centralization to decentralization*, which veils a cultural opinion of decentralization. Web communication dispels the *center-margin* model of traditional media in which the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 is the communicator,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s the power of communication changing. The characterized subject of network makes the language used on line overturns different rules of modern language, the narrative of network shows its *doubt* to *metanarrative* and is inclined to *small narrative of decentralization*. We should treat the postmodernism of network dialectically with an active cultural attitude.

Key words: Internet; postmodernism; characteristic